

盛典

温故而知新:孔子对《诗经》的诠释

张培水



孔子于《六经》之中,对《诗经》有巨大的偏爱,即便到了晚年,从卫国返回鲁国后,还把《诗经》中《雅》和《颂》的乐曲收集整理出来,恢复其咏唱的面貌。《论语》中就曾 18 次涉及《诗经》内容,这比其他经典的总和还多。我们以孔子诠释《诗经》为例,来诠释他“温故而知新”的重要思想,是一件非常有趣,又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这一章最值得玩味、深思。

“思无邪”原是《诗经·鲁颂·駉》中一句诗:“思无邪,思马斯徂”。“思”在此篇本是无意的语音词,“邪”字也不作“邪恶”讲,孔子解为“思想纯正”,以此概括《诗经》的思想,赋予其道德意义,奠定其治国理政的理论根基。

我们可以想象,当孔子想要总括《诗经》思想时,也是辗转反侧,苦思冥想,突然,灵光

一闪,“思无邪”三字浮现出来,一切就变得豁然开明。“思无邪”确实出自《诗经》,确实是对《诗经》思想的精当概括,而这三个字又分明是孔子心血智慧的凝聚。他借一句普通的诗句,表达出自己一个重要的观点。这三个字还是这三个字,但意思、意境全变了,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从这个意义上讲,孔子的“思无邪”已非《诗经》中的“思无邪”。

有人说孔子断章取义,有人说孔子牵强附会,但如果我们认为这是孔子创新的一种过程,那么这一过程有两个必不可少的要素:一是非对《诗经》精熟不可,《诗经》并非包袱、累赘,而是新思想诞生的母体。孔子曾说“学问和修养不会达到精深的境界。二是非打破前人的窠臼不可,旧的母体,时移世易,又会诞生出新的胚芽。亦如孔子所言:“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这里的“新”就是新体会、新发现、新见解,只有获得这些“新”之后,孔子才敢“为师”,才会有创新性发展。

其实,不止做老师应如此,似乎所有文化的继承发展都应遵循这个路径,不可因循守旧,不可凿空出新。在一个活生生的传统里,新事物不是旧事物的对立面,而是它的深化:若不能深刻理解旧,人们便无从创新;若真想有所创新,还必须认真审视那份旧。因而,人既要谦虚一点,向古人学习;还要灵机一动,找到属于自己的新东西。孔子曾说自己“述而不作”,只阐述不创新,似乎是一个很守旧的人,但翻遍《论语》,你会发现孔子无时不在创新,借古人之口来阐释自己的思想,实质是“以述代作”,更加智慧圆融而已。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矣”。孔子的学生子夏学习《诗经》很有心得,受到孔子的称赞,这让我们知晓如何才能温故知新。

子夏所问的文字出自《诗·卫风·硕人》,描写卫庄公夫人庄姜的美貌,不施粉黛,却绚丽无比。当子夏读到“素以为绚兮”,便问孔子“何谓也?”孔子以绘画来答复“绘事后素”。古人作画,先布五彩,再以白色分布其间,这样反而更能衬托绚烂的色彩。之后,子夏又推演出一个礼学道理,“礼后乎”。他认为礼如绘事之后的素,也就是礼作为人类社会的一种文明和文饰,它的实施必须建立在人类仁爱、忠信的道德良知之上。正如孔子所言:“仁而不仁如礼何? 仁而不仁如乐何?”孔子最欣赏学生的创新能力,“举一隅而不以三隅反,则不复矣”。子夏能举一反三,悟孔子言所未言,所以受到孔子高度赞许,“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矣”。

孔子就是这样,把一首描写女性美丽的诗篇,先类比联想到绘画上面,然后又引申发挥到“礼后乎”的伦理层面。这样解读已是全新的解读,已经和诗的本义毫不相干,或者说诗本身无足轻重了,孔子和子夏在这里很好的为我们演示了《诗经》由文学到政治的创新性转换。《诗经》是前人的,感悟却是自己的,《诗经》不会再起变化,但它却成了《论语》的源头活水。依据这个思路,我们可以这样解读,只要人的学问和道德还有提升的空间,那么对经典的挖掘探索就没有止境。

《论语》中,同样是写爱情,但孔子对两首诗的处理截然不同。《子罕》最后一章记载了这样一首诗:“唐棣之华,偏其反而。岂不尔思? 室是远而”。唐棣的花朵,翩翩摇动,怎会不思念你呢? 只是距离远罢了。孔子洞若观火,一针见血的指出:“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孔子看穿了这个主人公虚情假意、花言巧语,并未真正思念爱恋对方的本质,这属于最令孔子痛恨的“巧言令色,鲜矣仁”的范畴。这首诗被孔子从《诗经》里删除,因它无法给人带来正能量,任何消极、负面的东西,不能放任,至少不能成为主流,这是原则。

而另一首《关雎》,孔子评价为:“哀而不伤,乐而不淫”。君子、淑女在恋爱时节,在一起就快乐,离别就哀伤。孔子从中看出这种情感的美好和适中:快乐的时候不要过度,哀伤的时候也不要过度。由此得出普遍意义的结论:人,何时何地都要控制好自己的情感和行为,使之适度适中。至此,孔子的重要思想“中庸”已经呼之欲出了。

因此,孔子把《关雎》冠于《诗经》之首,与其说是讴歌了人性、情爱之美,倒不如说是孔子中庸思想的一个表达而已。孔子“温故知新”的落脚点很重要,孔子诠释《诗》,不是为了成为诗人、成为诗歌评论家,也不是站在古人的角度,探究为什么写和怎样写,而是重点关注它能为现实提供什么,能为现实服务,给民众一个正确指引,给社会一个正确的发展方向,就是好诗。

这两首诗的不同处理,我们似乎窥出孔子的苦心孤诣: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诗》只有立足现实,只有通过有效解读,用来教化民众,使之成为行动指南,才能称为“经”。春秋时期,《诗经》仅称作《诗》或者《诗》三百》,经过孔子创造性劳动,完成从文学作品到政治作品的华丽转身,成为治国理政的经典著作,从而获得新的持久的生命力。

惭愧的是,我们今天阅读经典,一般先看原文写的是什么,权威怎样讲,教参怎么说,标准答案是什么,“我”的见解呢? 全然没有,“故”还在,可渐渐失去了“知新”的能力。所以,一旦经中无我,只能经是经,我是我,怎样为我所用,怎样反本开新,都成了问题。读经永远不是一个僵死的事情,它就像我们从古人那里借来的一束火把,照亮了自己,照亮了现实。我们只有站在前人的肩头,而不是匍匐在脚下,才能看清未来的路。

文化自信的根源在于优秀传统文化,怎样搭起古与今的桥梁,怎样才能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孔子对《诗经》的诠释,会给我们不少有益的启示。 ■成岳 摄影

新格言

捣鬼的效果是有限的

王贵宏

热爱写作,每日闲暇时光都交给读与写了。读是充电,写是释放,只读不写,鉴赏能力日有所长,作文却易迟滞,二者若鱼水,不可弃其一。

读分精读和浏览,我精读的多是纸质书,置于案头或枕畔,像给知己打电话或发短信,经常放在心上,有空儿就翻上几页,细细咀嚼一会儿。

浏览是为写开拓思路,扩大认识世界的视野。然而,浏览亦有不快时,如昨日打开一家报纸今年的电子版,见副刊有一文题目甚是醒目。粗读一遍,便感此文写得颇具新意,文字亦生动活泼,给人较深印象。作者的名字是经常见诸报刊的,是我钦佩的名作者之一。今晨又上百度寻此文,意欲作范文学习,却发现有一同题的,打开一瞧却是去年另一位作者发表在另一家副刊上的。

二文一致,更觉不悦,抄袭连一点加工都未作,只是换了个名字。试想,网络时代,即使编者疏忽,作者和读者也会发现。

鲁迅说过:捣鬼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而我说,如果抄,肯定输。

创胆琴心

快节奏之下为生命留白

王淦生

“给生命留白”——好像是某个年份某省出过的一道高考作文题。其实,岂止是那些考场上的学生,我们这些当教师的,将这道题目拿来去做,也许是一件更有意义的事情。

不愿给自己的生命留下哪怕是一丝的空白,这似乎已成为当今教师群体的一个“行业性特征”——除非你到了退休之后,除非你已经身不由己。在我心目中属于“丰碑级”的著名教育家霍懋征、斯霞、于漪等前辈,即便在退休之后甚至到了耄耋之年,依然一刻不停地为教育事业殚精竭虑、奔波效劳,其生命的“充实”程度,丝毫不亚于那些在岗教师。更有不少尚处英年的年轻生命,在在讲坛上、在办公桌前溘然而逝,对他们来说,事业心、责任感、繁重的工作以及不期而至的病痛,已将短暂的生命填得满满当当,间不容发。那些因短暂而愈显凝重的生命,只有留待我们这些“后死诸君”去细细回味。这一现象的是非得失,也只有待社会学家去探究。而这,对于那些猝然而逝的生命,又有什么意义?

“睡得好比狗还迟,醒得比鸡还早”,这是曾经在网络上流行过一阵的两句半含同情半带调侃的描摹教师生活的“段子”。其实,即便在这极其短暂的“睡”“醒”之间,我们的老师又有多少问题需要操心费神:关于学校的,关于班级的,关于学生的以及关于自己任教学科的……各种繁冗的事务,似乎总在与教师那点可怜的休息时间做着拔河的游戏!至于在“眼睛一睁,忙到熄灯”的全过程中,备课上课、批阅作业、找学生谈话、接待家长访问……更是充斥着他们生命的分分秒秒。而在这同时,一位富有责任心的老师,又会想方设法设计出一件件“填充物”,将学生的生命空间填得严丝合缝:上课时一唱三叹的讲授,下课时纷至沓来的作业,节假日漫无休止的补习……这些,已将学生生命中所有欢娱赶得渺无踪迹。

可怕的还不仅仅在于生理机能和身体健康在紧张的生活中被完全透支,致使多少老师和学生处于精疲力竭头晕脑胀的“亚健康”状态,更在于人们心力交瘁的忙碌中萎缩了情感的细胞,退化了思想的机能,使老师学生的思想感情完全全地失去了应有的张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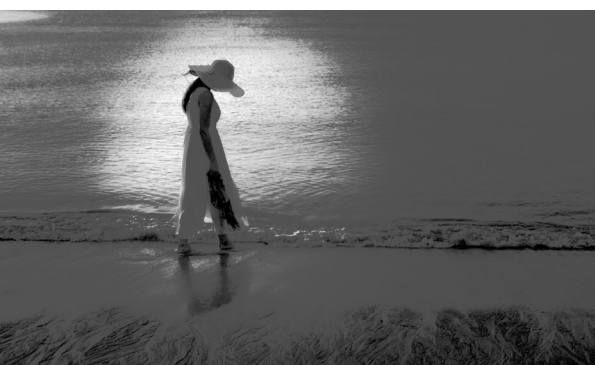
在我们曾经极为崇尚的生活方式中,我们的老师学生似乎早已成了一种标杆。他们在“考试”这一坚不可摧的指挥棒的催逼之下,整日思考的便是下一步做什么、怎么做,至于为什么这么做,这么做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则往往成了他们思维中的盲点,更不用说让他们静下心来总结过去,反思从前了。至于到了原本需要大量独立的“思想”因子投入的领域——那片属于知识分子精神家园的学术天地里,更多的中小学教师“领地失守”,让自己的大脑成了“别人的跑马场”——以考试大纲为“纲”,以课本为“本”,以教学参考书为“据”,哪里还有一点自己独立意识的参与!不少老师穷极一生,身体在点年级与低年级之间循环,大脑在教科书与标准答案之间循环,生命在学生考好与考坏之间循环;两鬓的华发一根根增多,眼前的镜片一圈圈加厚,答题的技巧一天天娴熟,资历与工龄一年年渐长……可是思想之树和创新精神却是一天比一天凋零萎缩!这正是当今中国“教书匠”层出不穷,而“教育家”凤毛麟角的根源所在。这恐怕也是我们的学子,在国际各类学科奥赛中摘金夺银而到了“玩真的”——比如斩获科技界的诺贝尔奖的时候,却难以出头的根本原因吧。有道是“名师出高徒”,即便是一个个“龙种”,到了有“技”无“艺”、有“匠气”无“匠心”的“工匠”们的窝里,恐怕最终也只能孵化出一只只“跳蚤”来吧?

古人论学诗,有“功夫在诗外”之说——要想写好诗,必须时时跳出诗歌的圈子。这正是为了避免“当局者迷”的视角局限,求得“旁观者清”的理想效果。而今天很多的老师学生非但跳不出这“诗歌的圈子”,反将所有的生活一概忽略,错以为“诗歌”乃是人生的全部,学习、工作之外的绚烂人生、缤纷生活,在他们眼中已经全无光彩,甚至无足轻重。一旦事业、学业受挫,多少人就此沉沦乃至自戕轻生……教育发展到这一步着实令人心痛。

给生命留白,是一个最起码的人生诉求。我们的身体需要时时从繁冗琐碎的事务中得到片刻的解脱,好让我们干涸的生命在与家人、亲友的情感交流中得到充分的滋养,好让我们倦乏的肢体得到适度的放松;我们的心灵需要一方净土,让我们去咀嚼回味过往人生,去整理调适自己的生命轨迹;我们要让一直高度绷紧的神经解开一开小差,体验到工作学习之外的乐趣,让精神的荒原上繁衍出片片绿洲……这样的人生,对自己,对他人会更有意义。

我们听惯了这样一句话:今天的生活是快节奏的。事实上,即便是再快的节奏,也是一个个短暂的空白作为单元分割标志的。我们为什么常常会忽视了这至关重要的一点?

■心飞扬 摄影



脸谱

梁山好汉中的美男子

成健

水浒英雄一百单八将,各有各的能耐,各有各的相貌。忠义堂排座次,虽假借石碣天文,却也大致按照本领、人品、资历和名望,决不以貌取人。不过,假如以相貌为标准来排座次的话,或许别有趣味。

第十、病关索杨雄。书中描述:“那人生得好看人物,露出蓝靛般一身花绣,两眉入鬓,凤眼朝天,淡黄面皮,细细有几根髭髯”。《水浒传》里有几个行刑刽子,长相都不恶,如蔡福、蔡庆兄弟,但相比之下,杨雄更加出色一些。

第九、金枪手徐宁。书中写道:“众人看徐宁时,果然一表好人物:六尺五六长身体,团团的一个白脸,三牙细黑髭髯,十分腰圆膀阔”。与杨雄相比,徐宁胜在白。

第八、没遮拦穆弘。穆弘的长相亦有诗为证:“面似银盆身似玉,头圆眼细眉单。威风凛凛逼人寒。”脸圆而白,看来是施耐庵评判颜值的一个标准。穆弘又在清涛中透着威风,难得。

第七、行者武松。打虎英雄自然器宇不凡,英气逼人:“身躯凛凛,相貌堂堂。一双眼光射寒星,两弯眉浑如刷漆”。不仅如此,后来为逃避官府缉拿,武松改作一副行脚僧打扮,又是与众不同:“额上戒箍儿灿烂,依稀火眼金睛;身间布衲袄斑斓,仿佛铜筋铁骨”。不由得张青夫妇脱口喝彩:“果然好个行者!”

第六、智多星吴用。吴用出场时就令人眼前一亮:“似秀才打扮,戴一顶桶子样抹眉梁头巾,穿一领皂沿边麻布宽衫,腰系一条茶褐褡带,下面丝鞋净袜;生得眉清目秀,面白须长”。如此清雅脱俗相貌,配得上满腹经纶,自可跻身前十。

第五、白面郎君郑天寿。郑天寿因生得白净俊俏,故而得名“白面郎君”雅号,怎见得?“生的白净面皮,三牙掩口髭须,瘦长膀阔,清秀模样,也裹着顶绛红头巾”。

第四、小李广花荣。作者对花荣的外貌不吝笔墨,有诗赞曰:“齿白唇红双眼俊,两眉入鬓常清。细腰宽膀似猿形。金圣叹也有一个评语:“可谓娇娥臣,翩翩儒将,分之两角,合之双璧矣”。

第三、玉麒麟卢俊义。书中写他:“目炯双瞳,眉分八字,身躯九尺如银。威风凛凛,仪表似天神”“眼珠如点漆,面部似镀银”。卢俊义活捉史文恭后,宋江欲遵照晁盖遗囑让出山寨头把交椅,并列出“三件不如员外处”,第一件竟是:“宋江身材黑矮,貌拙才疏;员外堂堂一表,凛凛一躯,有贵人之相”。

第二、小旋风柴进。且看柴进出场时的描写:“马上那人生得龙眉凤目,皓齿朱唇,三牙掩口髭须,三十四五年纪”。另一处又写道:“规行矩步端洋士,目秀眉清年少郎”。书中第六十二回写蔡福回到家中,忽有人叫他,“蔡福看时,但见那一个人生得十分标致”。由此可见一斑。

第一、浪子燕青。燕青是卢俊义的心腹家仆,然而身份并不影响长相。但见他:“六尺以上身材,二十四五年纪,三牙掩口细髯,十分腰圆膀阔”“唇若涂朱,睛如点漆,面似堆琼”。其仪表天然磊落,就连皇帝宠爱的李师师也对他心动不已。推燕青为梁山“最美好汉”,名至实归。

古今笔谈

哪有上天注定的命运

葛峰

袁了凡是明朝著名的思想家,小时候他上山采药,偶遇一个算命先生,说他有当官的命,明年就能考中秀才,劝他不要再学医。袁了凡将信将疑,征得母亲同意后,弃医从学,第二年果然考中了秀才,连名次都跟预测的一样。算命先生又算出袁了凡只能考中举人,当一任县令,甚至告诉他五十三岁寿终正寝,命中没有儿子。

既然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袁了凡心态反而放开了,于是寄情山水,也过得不亦乐乎。后来,一位禅师点醒了他:“命由自己造,福有自己求,哪有不可更改的定数?”一语点醒梦中人,袁了凡埋头苦读,发誓打破命运的魔咒。在京城,考中了进士,后在兵部做了官;不仅有了孩子,还是个儿子;不仅活过了53岁,还活到了74岁。

袁了凡让人肃然起敬,冲破宿命的藩篱是需要勇气的,因为古人很信命。既然“生死由命,富贵在天”,也只能“听命由天”了。时代的限制,思维的惯性,人们很难跳出宿命论的小圈子。一代豪杰项羽,巨鹿之战破釜沉舟,击败秦军主力,于辕门接见各路诸侯时,诸侯皆不敢正眼看他,气势何等磅礴!垓下之围,四面楚歌,项羽欲东渡乌江时,却改变了主意:“天之亡我,我何渡为!”民间有这样的传说,张良已用蜂蜜在乌江边写下七个大字“项王必死于此地,爱好甜食的蚂蚁就充满了字身”。项羽看到触目惊心的七个蚁字,勇气轰然倒塌,认为自己“天数已尽”,于是有船不渡,拔剑自刎了。司马迁

冷眼

不扣分不罚款:古代违“交规”怎么办

千年士心



如此种类繁多的交通工具,加上古代马路不像现在这么宽,又没有火车、飞机、高铁、地铁分流,人口素质肯定也没现在高,特别是在人口动辄几十万上百万的长安、洛阳、开封、杭州等国际大都市,如果没有“交规”,没有“交警”,大街上不得乱成一锅粥了?

既然需要管理,那肯定得制定“交规”。但是,古代“交规”是否比今天的好,这个不好说,但古今、交规、容易记,那是肯定的。

先秦文献《考工记》就有“交规”,不引用

了,因为读起来特别拗口,直接翻译过来就是:“城外有三扇门,三扇门中各有一条道路,男子靠右行走,女子靠左,而车辆在中间行驶”。这大概是最早的“人车分流,行人分流”交规。

唐朝《仪制令》是历史上第一部系统“交规”。该法规定“凡行路巷街,贱避贵,少避老,轻避重,去避来”。此规定体现了“三原则”:一是等级原则。就是地位低的,要避让地位高的;封建社会等级森严,没办法。二是尊老爱幼原则,这一条是古今通行的规则。三是尊重交通规律原则,比如“轻避重”“去避来”,此原则至今仍在沿用,否则,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后果很严重。

《仪制令》始于唐朝,盛于宋朝。面对都城开封交通秩序混乱的现象,公元983年,北宋朝廷下令:令京都开封及各州,在城内主要交通路口悬挂木牌,上书《仪制令》作为交通规则,人人都要遵守。这是在宣传普及交通法规。

到了南宋,交规宣传不仅由各州扩大到各县,而且由“悬挂木牌”发展到“刻石立碑”,以永久示人。今陕西西阳县灵崖寺就存有《仪制令》石刻的实物。不仅如此,宋朝还在各类主要交通要道处,都要求政府悬挂木牌

或树立石碑,上面写着温馨提示:此处为事故多发路段,请谨慎驾驶;坡度很陡,请谨慎驾驶之类,提醒行人遵守交规,确保安全。

既然有“交规”,就有相应的惩罚措施。可古人没有驾照啊,即使违反交规,既无法扣分,也不大好罚款,但古人自有古人的办法。

《唐律疏议·违令》中记载:“令有禁制,违者笞五十”。翻译成大白话就是:交通有禁令,违反要打屁股五十板。这些“交规”和惩罚措施,不只针对社会底层,王公贵族也不能豁免。

西汉文帝时,皇太子与其弟梁王驾车犯了“交规”,时任廷尉(公安部长)的张释之依法扣押两人,直到皇太后出面求情,汉文帝亲自替儿子道歉,张释之才释放了他们。不久,一位农民违反“交规”,冲撞了汉文帝的车驾。张释之审理后,依据“交规”处以“打屁股”的惩罚,本想将这位农民处死的皇帝很不理解,张释之解释道:“法者,天子与天下公共也”。最后,汉文帝接受了张释之的判罚。为维护“交规”的严肃性与法治的公平,张释之宁可得罪梁皇帝,能做到这一点,真的很难。

违反“交规”打屁股,唐宋最为频繁,这也证明了唐宋时期物流发达与经济之繁荣。 ■马婧婧 摄影